

论国学

刘梦溪
著

聚焦百年中国的思想·学问·文化·历史·人物
独体视角论说王国维·陈寅恪·马一浮现代三大师

论国学

刘梦溪 著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论国学 / 刘梦溪著. 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8
ISBN 978-7-208-07333-3

I. 论... II. 刘... III. ①治学精神-研究-中国 ②传统-文化-研究-中国 IV. G795 G1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24170号

出品人 施宏俊
责任编辑 何晓涛
设计 陆智昌



论国学
刘梦溪 著

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)
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(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)
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 635 × 965 毫米 1/16
印张 17.5
字数 155,000
版次 2008年1月第1版
印次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208-07333-3/G · 1188
定价 30.00 元

策划: 一石文化

目次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引 端 | 1 |
| 第一篇 论国学 | 11 |
| 第二篇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及其价值取向 ... | 57 |
| 第三篇 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 | 71 |
| 第四篇 王国维陈寅恪与中国现代学术 | 99 |
| 第五篇 王国维的诸种矛盾和最后归宿 | 133 |
| 第六篇 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精神义谛 | 147 |
| 第七篇 马一浮的学术精神和学问态度 | 185 |
| 第八篇 “文化自觉”和“美美与共” | 209 |
| 第九篇 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问题 | 221 |
| 第十篇 《红楼梦》与红学 | 235 |
| 跋 尾 | 277 |

引 端

这几年学术演讲成风，不佞也难能免俗，或大学，或学术机构，或省市、中央部门的热心此道者，诚诚相邀，却之不能，便也有几次误入这以口说学的“迷途”。加之研究生的授课，更是责无旁贷。当然可以辩解说，我国原有讲学的传统，宋人尤长于此，明人继之不衰，只有清朝施行文化专制，惟恐知识人士不顾“天良”，把背地里的“腹诽”变成当众的“口谤”，索性取缔了讲学活动。晚清变法维新的潮流不可遏止，爱新觉罗氏的统治欲坠摇摇，讲学之风遂又兴起，而尤以欲“营一隅而为天下昌”的义宁父子（陈宝箴和陈三立）所倡立的湘省南学会，讲论之风最著。

南学会的讲论每月四次，讲论范围分为四科，皮锡瑞主讲学

术，黄遵宪主讲政教，谭嗣同主讲天文，邹代钧主讲舆地。演讲时，听者可以发问、辩难，和今天的学术研讨会非常相似。南学会举行成立庆典那一天（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二月初一、公历1898年2月21日），湖南巡抚陈宝箴亲临会场，以《论为学必先立志》为题发表讲词。皮锡瑞讲的题目是《论立学会讲学宗旨》；黄遵宪讲《论政体公私人必自任其事》；谭嗣同讲《论中国情形危急》；乔树枬讲《论公利私利之分》，都是关于变法维新的内容。

《湘报》第一号对演讲的情形作了报道：

本年湘士大夫创设南学会，假孝廉堂为会所，每月以房、虚、星、昂之日为讲期。二月初一日，为南学会开讲第一期，陈大中丞、徐学使、黄廉访，咸会官绅士民，集者三百余人。堂上设讲座，下排横桌，听讲者环坐焉。初会时，履交错，士大夫周旋问答，言笑晏晏，在所不免。钟十二下，主讲诸公就坐，会者毕坐。堂上铃声作，执事者唱毋哗，咸屏息敬听。首皮鹿门学长开讲，继之者黄廉访、乔茂萱比部、谭复生观察，最后陈大中丞宣讲。讲毕，堂上铃声作，众皆起，鱼贯趋出。于是士大夫啧啧称羨，以为贤长官用平等之仪，讲会学之旨，情比于家人，义笃于师友。此事为生平所未见，不图今日见三代盛仪也。闻湘省之风者，可以与起矣。

如此热烈、自由、亲切、体现民主精神的聚会讲论，只有现代政治体制下方有可能实现，可是1898年的湖南做到了。南学会的讲论会，据《湘报》记载，总共举行了十三次，演讲人除皮锡瑞、黄遵宪、谭嗣同、乔树枬外，另有邹代钧、李维格、曾广钧、欧阳中鹄等。

陈宝箴讲了两次，第二次演讲的题目是《论不必攻耶教兼及周汉事》，把震惊中外的周汉事件作为一个案例，阐述他的宗教观点及“有教无类”的多元文化思想。可以想见，如果不是慈禧太后在1898年秋天发动政变，变法维新的势头得以良性的发展下去，晚清到民国的国家面貌大约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。这也就难怪陈宝箴的裔孙、晚清大诗人陈三立的哲嗣、我们的史学家陈寅恪先生，当百年之后回忆起戊戌党祸时，还要写出“家国旧情迷纸上，兴亡遗恨照灯前”这样极沉痛的诗句。我们在陈寅恪的《诗集》中，还可以找到很多类似的例证，比如“儿郎涑水空文藻，家国沅湘总泪流”、“死生家国休回首，泪与湘江一样流”等等。总是把自己的“哀伤”和戊戌之变和对湖南的“记忆”联系在一起。本书有关陈寅恪的两篇文章，都涉及到了这方面的内容。尤其《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精神义谛》，是我为《陈寅恪学记》一书写的前记，对陈寅恪的“哀伤”与“记忆”作了专题论述。我以为这是理解陈寅恪的诗歌创作，理解他的学术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一把钥匙。另一篇《王国维陈寅恪与中国现代学术》则是讲演稿，读者从行文语气可以看出来，连听众回应也予保留。

清华国学研究院“四大导师”，王、陈的关系原比较特殊，所以王的遗嘱郑重委托：“书籍可托陈、吴二先生处理。”这无异于文化托命。吴是诗人吴宓，国学研究院主任，陈寅恪的哈佛同学，一生都以寅恪为友。

陈回报于王的，一是1927年静安先生逝后，写了一首挽诗，其中名句：“敢将私谊哭斯人，文化神州丧一身”，以及“吾济所学关天意，并世相知妒道真”，常为研究者所引用。二是同年又写了一首挽词，题作《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》，词长112句，等于为王国维写了一篇诗体的学术传记。而《挽词》前面的“序”，则可以看作是陈寅恪先生的一篇文化宣言。尤其序中对王国维死因的诠释：“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，为此文化所化之人，必感苦痛，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，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，迨既达极深之度，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。”提出了“殉文化说”，对王、陈具了解之同情的学者奉此“序”为文化论说之圭臬。三是1929年为清华大学的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碑铭，重释王的死因，曰：“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，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，一姓之兴亡。”提出：“先生之著述，或有时而不章；先生之学说，或有时而可商。惟此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，历千万祀，与天壤而同久，共三光而永光。”四是1934年所作之《王静安先生遗书序》，把王书的学术内容和治学方法概括为“三目”，即第一，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；第二，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；第三，

取外来之观念，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。则知王者，真陈寅恪也。本人近十余年来，花在陈身上的时间最多，但研陈必涉王，故亦写了一些有关王国维的文章。《王国维的诸种矛盾和最后归宿》，就是我的一次演讲稿，试图通过对王的精神世界的追寻，为其最后归宿找到一些伏脉隐因。

论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两篇文章，是为一次特别的演讲专门写的文字稿，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我对相关一些问题的看法。我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归结为十三个方面的内容，其中讲到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时，我提出，中国古代并没有“国家”这个概念，但非常重视“天下”。“天下”包含“社稷”和“苍生”两部分。“社稷”的原意是对土神和谷神的祭祀，后来用来指国家政权。和“社稷”连用的是“江山”，“江山”就是指疆土、国土。“社稷”和“江山”加起来，相当于国家。“苍生”本义是指长得很乱的草木，后专指百姓。我由此得出了一个公式：

社稷 + 江山 = 国家

社稷 + 苍生 = 天下

这个公式颇能反映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特征。

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化圈之一的文明古国，其古代文明的灿

烂辉煌是有目共睹的，但中国的近代文明却落在了西方的后面，现代性赖以生存的科技革命，我们中国没有发生。原因何在？这道据说是“李约瑟难题”，我在《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》一文里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我认为农民起义循环往复的发生，和每到历史转变的关键时刻就有文明程度落后的少数民族占据中原，是中国不能及时走向近代的重要原因。而晚清以还伴随西潮冲击和帝制瓦解出现的传统价值的失落，又让现代社会的文化整合呈一极困难的局面，直到今天仍然是尚未完结的课题。因此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驻中国代表、汉学家让-吕克·多梅纳克提出的：“是什么使得中国与自身脱离？”龙应台在《紫藤庐和星巴克之间》所说的：“传统不是怀旧的情绪，传统是生存的必要。”让我感到极大的兴趣。我近年的研究题旨和我主编的《中国文化》杂志，不无祈望为中国文化传统的重建稍尽绵薄的寸草之心。

中国20世纪大师级学术人物中，陈寅恪和马一浮是我的偏好，以至于李泽厚认为我偏爱过甚。但“爱”是一种情感，“好”是兴趣的归宿，改变亦恐不易。故本书也选录了一篇谈《马一浮的学术精神和学问态度》的文章，以便和王、陈的学术精神有所比照。《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几个问题》和《“文化自觉”和“美美与共”》，倒是原味未变的演讲，由我的学生根据录音整理后，再经我手订润色而写成。我相信我是有所为而发，其针对性考虑到了“虚”、“实”两个方面。《〈红楼梦〉

与红学》也是“原味”演讲，时间在2006年11月24日，是最近的一次。本来我怯于讲《红楼》，由于广西师大出版社要出我的《情问红楼》一书，配合“造势”，不得已而为之。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廖齐先生帮助我把录音记录成文字，我一看还挺有意思，包括讲后的答问互动，内容也颇充实。于是也入选，只不知读者看了是否会与我有类似的感受，我不敢预期。

最后，需要谈谈《论国学》这篇文章。从20世纪初开始，“国学”这一概念就提了出来，章太炎“独欲任持”，影响昭著。20年代成为流行，致有北大国学门和清华国学院之设。但异议的声音亦不绝于耳。主要是“国学”这一笼统的概念和现代学术分科的关系不容易得到圆解。现代学术分科的结果，已经使得“国学”独立义涵的应用性大为减弱。胡适倡议“整理国故”时就已经提出，要文学的归文学，哲学的归哲学，史学的归史学。所以北大和清华的两个国学机构只各自维持四年的时间，以后便不再。连写《国学概论》的钱宾四先生也说：“学术本无国界。国学一名，前既无承，将来亦恐不立。特为一时代的名词。”（《国学概论》弁言）马一浮更从学理上给以论证：

国学这个名词，如今国人已使用惯了，其实不甚恰当。照旧时用国学为名者，即是国立大学之称。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，意思是别于外国学术之谓。此名为依他

起，严格说来，本不可用。今为随顺时人语，故暂不改立名目。然即依固有学术为解，所含之义亦太觉广泛笼统，使人闻之，不知所指为何种学术。（《马一浮集》第一册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9页）

马一浮对传统学术的名理及佛学的义理有极深湛的研究，解一词名一物必从学理出发追寻正解。“国学”一名“为依他起”，就是他找到的学理上的依据。所以连续给了两个否定性的语词，一曰“不甚恰当”，二曰“本不可用”。

但自去夏开始，中国的“国学”突然热动起来，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，小学设置国学班，互联网上如火如荼的遴选“国学大师”，大有以“国学”作为现代性的指标之势。我本人的研治领域虽并未逾出传统学术文化的范围，但“国学”的概念，惶恐而不敢多用。我主持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及《中国文化》杂志，尽管以“深研中华文化，阐扬传统专学，探究学术真知，重视人文关怀”为期许，但国学的概念并未进驻我们的视野。此无他，无非觉得“国学”一词终难脱却“自秘”、“自固”、“自赏”的嫌疑，与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理念，与国际间学术文化交流互动的需要，似有不尽相合之处。因此我对国学的发生缘起及其演化过程，作了一番梳理考察，提出我们应该慎用国学这个概念，或至少不必那样“热”。但是，如果仅仅在它的狭义的范围，即将国学楷定为“六艺之学”，我又认为并非不可用。说“六艺”即

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是我们的国学，无论国内国外的学者想必无更多的异词。当然《乐》已不传，只剩下“五艺”，或曰“五经”。我因此主张我国小学不妨专设“国学”一科，俾便使作为我们华夏民族精神源头的文本经典，终有一天成为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。

我只是一隅之见，质之明学之君子，不知然否。

2006年10月22日

于京东寓所



第一篇 论国学

近一个时期，具体说自2005年夏天以来，“国学”一词的报刊使用率越来越高了。有的大学正式成立了国学研究院，小学生的国学班时有开办，互联网上遴选“国学大师”的举动如火如荼，因此有人说如今已经出现了“国学热”。其实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也有过一次关于“国学热”的讨论。评估今天的“国学”景况，需要从上世纪90年代讲起。

90年代的“国学热”

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国思想文化界，曾围绕四个问题展开一

场相当热烈也可以说是激烈的讨论、争论和辩论。第一个问题，是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，人文精神的失落与重建问题；第二个问题，是所谓“后现代”的问题；第三个问题，是80年代和90年代文化思潮的异同问题；第四个问题，就是所谓的“国学热”问题。

但90年代讨论国学，不像今天这样能够始终保持学术的向度。一些讨论文字刚一出手，就带有意气（我正面用此词，魏征诗“人生感意气”）和锋芒，而且往往与当时的“后现代”话语联系起来。香港中文大学《二十一世纪》1995年2月号发表的赵毅衡的《“后学”与中国新保守主义》一文，把当时的所谓“国学复兴”，作为“一个强大的新保守主义思潮正在中国知识界翻卷起来”的直接证据。而锋芒最著的，要属何满子的《“后国学”的虚脱症》。现在流行“酷评”，何当年的一些批评文字，已带有“酷评”的味道。他说：“近年来国学已被炒得很烫手，看模样好像是里应外合，由海内外新儒家们一起鼓噪起来的。”他还讥讽道：

十足的国粹、国学绵延不绝，正规的研究也进行得好好的，突然金鼓齐鸣地大喊大叫起来。又不曾听说从《老子》书里发现了高能量的芯片，《墨子》书里发现了信息高速公路，或《易经》发现了太空火箭，定要劳动书斋里的大师、准大师们声嘶力竭地弘扬？此理实不可解。

何的文章刊载于广东《随笔》杂志1995年第7期。在这之前，陈

漱渝发表在《哲学研究》1995年第5期上的文章，对“国学热”同样做了非常激烈的指责——他文章开头的第一句话就写道：“80年代文化热，90年代国学热。”然后说：“在国学之中，热门的热门是儒学。”但特别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，是陈漱渝对孔子仁学的解释，他说：

从字面上看，“仁”就是“爱人”，就是“济众”，即提倡所谓人类之爱。在仅把奴隶当成“会说话的工具”的奴隶社会末期，这种思想当然具有不容抹煞的历史进步性。但我们必须看到这种说法是以“严等差、贵秩序”为前提，以“礼”为道德规范；也就是说，它从根本上是为了维护血缘基础与宗法等级。

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，很少能够看到的一篇在国策中已经取消了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的背景下，对孔子思想再次作“阶级分析”的文章。

1995年第5期《哲学研究》在刊载陈漱渝先生文章的同时，还刊出一篇署名的《五四精神与传统文化学术座谈会述评》（署名李登贵），这篇述评有下面的一些话：

新儒学和国学目前热过了头。一些昔日频繁出入马克思主义武库的人如今已幡然易帜，一些昔日的全盘西化论鼓吹